

轻柔的
爆冬的春雷
南飞子规
阵啼血的奇伟
瀑流水江草
大小心的扉
缠有的山
青没的只

世纪末

的中國

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非正式报告

燃眉之患
痛苦的年代
黑魂囚徒
红装之泣
世纪风险
澳星报告
暗访急
共和国的
沉重的车
失落的站
刑场的太阳
人鬼之响
战之前

主编 杜卫东 解伟

世纪末的

年 國

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非正式报告

主编 杜卫东 解伟

责任编辑:黄智本 秦蜀鄂

封面设计:符晓笛

技术设计:车半李

世纪末的中国——问题透视

杜卫东 解 伟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国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 1168×850mm 1/32 印张 23.25 插页 4 字数 556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763—5/I·560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33.00 元

序

萧乾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报告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方面军。跟其它文学样式比较，它更是一种看取当前，贴近现实，捕捉新动向新变化的文体。这一文体活跃于解冻以后我们所置身的这样一个变动时期，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的。对于未来的文学史家来说，研究产生这一文学现象的背景和研究文学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实际上包涵了文学的最根本的原理。

今天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四卷本最新报告文学精选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阅我们报告文学实绩的集萃式但难免挂一漏万的选本，可算是一个便览吧。对喜读报告文学，又苦于其分散的读者来说，看这套精选本，是一条捷径。它也使我再一次地想到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报告文学这一个方面军，我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会是副什么样子？别的不说，至少在现实感这一层上，一定会暗谈许多。为什么呢？因为报告文学不但是文学，它还是紧密地关切当前现实事变、生活流程的文学，新、紧、近、真、深，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看到不少诗人和小说家进入了自我内心，进入过去进行时，以求得逃避和解脱，但报告文学却走不了

那条路。一般说来，它是现在进行时的东西。它的路是向前，是直面当前现实。这是它的规定性，是它的命运，也是人们需要它的地方，因而也是某些人物不悦于它的原因。

它无路可逃。

当年做记者时我抱定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写下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有保留的价值。于是我尽量把它们写得文学性强些，艺术化一些。除全局上的把握外，我力求以小见大，通过具体的场面、故事、细节，再现生活，表达判断、思考，感染读者。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报告文学的概念应该说不谋而合的。我无意于在年轻作者们面前摆老资格，我只是想说：报告文学写到了今天，希望你们越写越好，更加向深刻、伟大的目标接近。

而我们这些年轻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活跃的热情，使他们的笔触成为了读者可以信赖的向导，可以亲近的朋友。这也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

斯诺曾一再告诫我：光看旁的记者（无论名气多大）写的文章是提不高的，要钻研经典文学著作。他是一个强调艺术和语言的人。我从燕大毕业时他送给我满满一皮箱欧美名著。从他身上我还看到：写作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需要有历史感，抓到事物的本质。这两点，对我们年轻一代作家，包括报告文学作家，仍然非常重要。这套选集，也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这方面的功力。

紧握现实与高明的艺术手段，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立于不败之地的两条结实的腿。而指挥这两条腿的是思想。

《世纪末的中国》，这个书名起得很好。我们大家都听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钟鸣和新世纪蹒跚到来的脚步声。当着未来的人们偶然有兴趣，翻阅到这套选集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在读史记——可作为信史来读的史记。这会有助于消弥他们和我们之

间的隔膜，达成世纪间的沟通，也有助于他们避免我们世纪曾经走过的弯路，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使他们的世纪更为光明一些。

1997. 3. 20

世纪末的中国

第4部：问题透视

目次

1	燃眉之患 ✓.....	苗振亚
77	世纪之泣 ✓.....	杜卫东
145	黑 魂	连继民
197	红装囚徒	田珍颖
247	黑太阳祭	安文江
268	共和国告急	何建明
378	忧患八千万	黄传会
412	澳星风险发射	李鸣生
495	沉重的车站钟声	傅溪鹏
595	失落的太阳	王灵书
636	刑场枪响之前	莲 子
667	黄土地 黑土地	马役军

燃眉之患

· 苗振亚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世界环境会议，参加会议的政府首脑只有两位，一位是瑞典首相帕尔梅，一位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其后成立的环境规划署，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联合国机构。更有甚者，有人竟认为此次会议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事隔20年，一切都不一样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环境首脑会议上，已经有183个国家的首脑与代表坐在谈判桌边，通过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环境宣言——《地球宪章》，并为实施这一宣言而制定了内容具体的《21世纪议程》。

环境问题已成为地球人类最紧迫的问题。

——题记

在充满物欲的人类眼里，地球也许就象一只魔方。人们把蓊郁的森林砍掉，竖起钢筋水泥的森林；人们把浩瀚的大海填平，让沧海变陆地；人们把滔滔长河阻断，要让“高峡出平湖”；人们要以车代步，让双腿从此不再走路；人们要用空调机制造出人工气

候，从此把自然界的严冬酷暑隔绝在房屋之外……正当人类将手中的这只魔方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时，一些恼人的麻烦事也接踵而至。这些麻烦事，如今都有了约定俗成的名字，它们是：水污染、空气污染、淡水短缺、臭氧层耗竭、人口爆炸、荒漠化、酸雨、核废料、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

在追求物质占有的过程中，人类过于自信了，也过于放肆了。人们把空气、水、森林、土地，以及贮藏了亿万年太阳火光的矿石燃料，当成大自然无偿的恩赐，毫无节制地掠夺，挥霍，以至于把我们的生物圈一号——地球，弄得肮脏、贫瘠、失去平衡，许多地方甚至弄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人类把自己送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第一章 脚下的土地在沉沦

土地对我们是太重要了。土地的数量也太有限了——只有一个地球，造物主不会再凭空送一块土地以厚爱我们。按理说，我们应该十分珍惜这有限的土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移向任何一方土地的时候，心头都没有一丝欢乐，只有为我们的今天与明天担惊害怕。

●我们的土地已百孔千疮，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下沉等地质灾害愈演愈烈。

对于地质灾害，一般人也许只知道地震的可怕。尤其是当年的唐山大地震，来得是那么突然，那么威猛，霎那间就毁掉一座

繁华的城市，几十万生灵命归黄泉，防震棚一时成为全国的风景，以至于多年后谈起地震还心有惊忧。而对于同样可怕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却缺乏了解。笔者同样如此。当1990年春天，读过何建民写的报告文学《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后，我被惊呆了，第一次知道这类灾害的毁灭力量与恐怖气氛。

1981年8月16日与9月3日，宝成铁路发生两起山岩崩塌事故。

8月16日上午9时40分，位于广元军师庙火车站边的大山突然出现松动，这时，铁路上正停着刚刚开来的164次旅客列车，列车上的千名旅客很快知道是怎么回事，个个惊慌失措。反应敏捷的司机刚想启动机车，以脱离这个可怕的危险地带，可已经来不及了。巨大的石流已经越过沟道，堆上钢轨，劈里啪拉砸着车厢，击碎玻璃飞进车厢里来。与此同时，陕西阳平也遭到大山崩塌的袭击，812次货车的七节车厢倒在路旁，电动机车翻进了嘉陵江。当这场灾难的抢救维修工作还未做完，电动机车还沉在嘉陵江里，9月3日，又在军师庙的同地点发生一起更严重的山体滑坡。几百米的高山上突然冲下2500立方巨石，把宝成铁路一下子推到了嘉陵江对岸，汹涌的嘉陵江被飞下的石块阻断，直到十二分钟以后才重新通水。

其实，宝成铁路上的地质灾害，早就象家常便饭一般常年不断。仅在这一年就发生了887起，只是以9月3日这一次为最严重而已。这类地质灾害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就象一位地质专家所说：“那些本来就是岩体断裂、壁陡崖峻的山坡，你把它身上的植被啃得光光的，雨水一来，它能不崩塌滑坡吗？”

这以后，当我与一位地矿部门的朋友谈起这场灾害，朋友睁大了惊奇的眼睛，告诉我，这种事何止是发生在宝成铁路。1985年6月12日，湖北秭归县新滩镇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3000多万

方土石从山顶直泻而下，天空地面、轰响一片，一个千年古镇瞬间从地球消失，长江为之断流，整整三个月后才得以通航。1989年7月10日，四川华蓥市溪口镇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当人们一听动静，就顺着山沟奔逃，也未能逃脱泥石流的袭击，293人的血肉之躯覆盖在泥石之下，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多带残疾。1994年4月30日，在长江上游的武隆县境内，一堵高300米，宽400米，厚100米的山体与群山分离，轰然冲向千米以下的乌江，怒涛滚滚的乌江顿时为之断流。一座煤矿埋进泥石，两艘拖驳沉没江底，几艘渔船被大浪卷得连连打滚。沿江的20多个县市、1500万人通往外界的捷径，被一江乱石无情地阻断。据称如此严重的崩岩与通航中断，为乌江有史记载以来所独见。

从已经存在的事实与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地质灾难确实是愈演愈烈，频率也在逐渐加快。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所致。这些年来，由于人口增加，工程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山区资源过量开发，森林植被严重破坏，作用于地表与地下的影响加大，改变了地质运动的自然进程；再加上超负荷开采石油、天然气、地下水和固体矿产，这就人为地形成和诱发了地质灾害。

可怕的地质灾害，事实上也给人口越来越多、大楼越来越高的都市抹上一层浓厚的阴影。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我国有很多城市原本就座落在危岩之上，加之人为负荷的增大，就时时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难道说，不在危岩上的城市就没有颠覆的危险吗？也许并不如此。人们都知道，金属能够疲劳，桥梁能够疲劳，生物体能够疲劳，疲劳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应该存在疲劳。当我们让同一块土地反复承受过重的压力，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这块土地的疲劳，以至于引起局部地层压力的改变。考古已经发现，我国西安、开封、徐州等古代繁华一时的名城，都存在着地下城，而从这些城市出现以后并未发生过足以造成城市

沉埋的地质活动，这有可能是城市本身的地质疲劳所致。因而，我们的城市不管是处于危岩之上，还是不在危岩之上，都无法保证永远平安无虞。大规模的灾难虽然还未到来，但其先兆已经出现。1977年9月20日在武汉中南轨钢厂，原来料场上堆着小山一般的煤炭与钢坯，一夜之间即不见踪影。过了10年，与这家钢厂隔江相望的沙洲陆家街，又发生一件类似的怪事。45家居民的住房一瞬间从地面上消失。1985年8月在大连，九号台风过去，一场暴雨下来，雨过天晴，告急电话却接二连三打到市政府来：羊毛衫厂的几栋厂房被埋到地底下去了；运动衣厂的厂区内外地面出现很多裂缝；有的房屋向海滩滑下几十厘米，100多米的护坡墙塌了；有的钢筋混凝土楼墙开了裂，一栋栋民房从斜坡滑动而下……经地质工程师调查，这不是地震，是地面塌陷，并预计到2000年，这个城市的百分之四十的建筑物面临此厄运。在西安，自从10年前出现第一条地裂缝以来，现已增多为10条，总长已有77公里，已经使40座厂房、70处住宅、200余间平房和上百处道路受到破坏。为修补裂缝造成的建筑损失，成了这个市年复一年的永久性工作。据地质部门报告，我国城市出现地裂缝已相当惊人。在陕、甘、宁、晋、苏、皖等十几个省区的200多个市县，已发现地裂缝近800外，大型地裂100多条，每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在山城重庆，1949年6月的洪岩洞大滑坡，在老辈人的脑海里还记忆犹新，那次惨案死亡300多人。而自建国以来，重庆就发生危岩、滑坡数千起，200多人丧生，3000多人受伤，毁坏房屋5000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元。重庆的地质构造是不稳定的，而人也太多了，房屋也太拥挤了，据说这里还想建造亚洲最高的楼，这又不免又增加了人们对其未来命运的担心。

对我国大部分城市来说，当前最为担心的还是地面下沉。

地面下沉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地质构造、采矿、建筑物过多

过高过重，以及地面负荷次频繁等原因，但主要原因是过量开采地下水。以往，这种现象只是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出现，近些年，随着需水量的增加，在北京、西安、太原、沈阳等内陆城市和苏州、无锡、常州、阜阳、包头、大同等中小城市也相继发生。

在常州，地面下沉已有300多平方公里，最大沉降已有50多毫米，由此造成井管倾斜、井台开裂、桥下净空缩小、下水道堵塞或排水不畅，地面污水积存不干，城市污染严重。在徐州，地下水位急骤下降，现已在基岩面上下波动，已经引起城区多处地面塌陷，1993年底塌陷面积已达3万多平方米，造成房屋倒塌，居民被迫搬迁，数家工厂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3500万元。在西安，地面下沉已使市区2000多座建筑物受到损坏，唐代的大雁塔倾斜已达1米，虽采取种种措施，终因地面的继续下沉而徒叹奈何。在天津，最大地面下沉幅度已超过2米，因地面下沉而造成污水倒灌，积水淹没工厂，交通阻塞，海河泄洪能力大大降低，年年都要加高塘沽新港堤坝，损失无法估计。仅是盐场坨地码头，每年就要填土10万平方，耗资50万元。

我们明明知道地面下沉的主要原因是过量抽取地下水与采矿引起的，但又无法停止这种自食恶果的行为。不采矿不行，不喝水不用水更不行。我们是个缺水国家，我们太缺水了。

由于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下沉等地质灾害，也许终有一天会逼得我们迁都移城。在读古希腊史的时候，城市的兴衰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巴比伦、特洛伊成了废墟，但在另外的地方又展示出新的城市繁华。今天，毕竟不同于古希腊，甚至不同于10年前、20年前，毁灭的因素增多了，加剧了，但有什么地方可供我们再建新城呢？

●挖甘草，掏金矿，草原牧场荒漠化，滚滚风沙已经威逼沈阳城。

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都知道沙漠的可怕。那是一种无法阻止的疯狂与残暴，是对土地上一切生灵的死刑判决。据《一九九二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已从过去每年1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100平方公里，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受到风沙威胁，沙进人退的形势在一些地区已经十分严峻。在河北省康保县，有个与内蒙古接壤的村庄，长年受风沙侵袭，致使道路房屋被埋，耕地严重沙化，几十年来曾经三次举村搬迁，成了当地有名的贫困村。类似的情况，在陕甘晋冀等省并不鲜见。

我们诅咒沙漠，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放出一群如此疯狂的恶魔。

其实，从根本上讲，沙漠并不是造物主的产物，而是人类自造的罪孽。据古籍记载，与埃及、中国、希腊并列为古代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巴比伦，原先也是一个水草肥美、树木葱茏、雨量丰沛、土壤肥沃的所在。然而，巴比伦的先民们却在这肥美的草原上无限制放牧羊群，羊群繁衍失控，以至于多到无人认领的地步，大片的绿草终于啃得干干净净。又加上巴比伦人一代又一代挥动利斧乱砍滥伐林木，使绿色植被与地面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水土大量流失，绿林沃土终于演变成一望无际的热带沙漠。一个文明古国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问题就是如此简单。又据考古学家考证，就连那荒凉无比、被世人称为死神故乡的撒哈拉大沙漠，原来也是一个浓荫密布人烟稠密的地方，也是由于毁林烧树，超量放牧，使成片的莽林逐渐消失，雨量逐年减少，水位逐年下降，河流逐条干涸，丰美的草原干枯，肥沃的良田变成

干粉一般的沙土，大片绿洲变成点点绿洲，最后被沙漠一夜吞光。我国的塔克拉玛干大戈壁、毛乌素沙漠，自然也是这样来的。

森林与沙漠的关系，似乎人人心里都明白，知道植树造林，爱护植被，是防止沙漠继续扩大的方法，甚至是再返昔日生态的唯一途径。道理确实如此，但是，破坏了，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人性的贪婪与生存的无奈，还在继续榨取那所剩不多的绿色。

八十年代中期，《光明日报》记者赵雅丽在一篇文章里描绘过我国沙漠的惨景：“北方沙化面积正疯狂扩展，上亿亩农田，草地和数千里铁路、公路危在旦夕，一些城市甚至有被埋没之虞。内蒙古乌海市，过去城北灌木草丝茂密，黄沙望而却步，1982年以后，那里弃草取土建起砖瓦厂，使沙丘得以肆虐，每年以2~3米的速度向城市推进。去那里考察过的专家说，再过5~10年，乌海市有可能被沙丘埋没。如果你乘坐自兰州经由内蒙古至北京的火车，在2000公里的铁路线上，你将目睹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光秃秃的山坡尘土飞扬，淡褐色的沙土地，干涸的河床比比皆是。就在这片沙漠化的土地上，不时可看到密集的村庄。一位生态专家忧虑地说，如果沙化速度得不到控制，‘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很可能就是我们子孙后代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

勿须等到子孙后代。也许，我们的生态学家怕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惊慌与不安，总是把生态危害讲成未来的事情。可现实是无情的，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就在1994年4月，新闻传媒不得不告诉人们：风沙已经逼近沈阳城。这绝非危言耸听。科尔沁的滚滚黄沙已经越过内蒙古，正以每年平均30米的速度，向沈阳市的康平县日夜挺进，已经确确实实威逼到沈阳城了。沈阳人已经不敢高枕无忧地把沙漠当成与已无关的事情了。

在康平县，包括林地水面在内的320万亩地域，已有108万亩

成为沙化或半沙化土地。全县与科尔沁接壤的114公里边界线上，风沙口就有22个，每年上万吨沙土就顺着这些风沙口卷进康平县境，使康平的纯沙漠面积已达3万多亩。康平县的小城子镇，是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方，全镇8万多亩土地基本上都被风沙覆盖。有些村子已被风沙四面包围。在杨家堡附近的曹家村，几十米高的大沙丘推进到距房屋不到20米的地方，一棵棵高大的柳树杨树就立在沙漠之中，有的已被沙漠埋到只剩下了一点点树梢。风沙已把大家推上死路，最后的生存欲望使大家自觉自愿地站出来与风沙搏斗。共同的劫难消弥了攀比与窝里斗，大家团结一心，不约而同地四处寻找固沙的树种草籽，育苗栽树种草，节约下一滴滴水以滋润绿色的延伸。在沈阳城，风沙逼近已造成这里的气候生态失常，冰雹、大雨、龙卷风等恶劣天气日渐增多加剧，有风无风都是一城沙土。如果遇上大的干旱，沙借风势就可能霎时涌进沈阳城。在非洲，曾有沙土越过大西洋上空4700公里落进巴巴多斯的纪录，何况这里的沙漠近在咫尺。因而，对康平县等三北防护林带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已成为沈阳市的紧迫之事。只是不知道这种努力，是否能够有效地阻止沙漠继续向前滚动。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一个地方在为防沙治沙殚精竭虑，另一个地方却置脆弱的生态与危险的后果于不顾，疯狂掠夺资源，为土地的荒漠化进程推波助澜。

近年来，在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流窜着一支又一支采挖甘草的人群。他们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的一大祸害。

每当进入三月，气候变暖，草原回黄转绿，滥采乱挖甘草的队伍就如候鸟一般适时开进草原。十几年前，草原牧民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地得天独厚的甘草资源，会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以至于把他们推入沙野，推入生活的绝境。

甘草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固沙防风能力很

强的植物，营养价值很高的牧草。有了它，才有了草原，有了羊群，有了牧民的立足之地与生活之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甘草，才有了牧民的家园，失去甘草，牧民也就失去了家园。

采挖甘草的人群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也越来越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什么牧民的利益，什么草原的生态，他们眼里除了甘草还是甘草。他们滥挖甘草，更发泄剩余精力逞强欺弱、强奸妇女、偷抢扒拿、聚众滋事，搅得牧民日夜不安。一些挖甘草的成了万元户，一些靠经营甘草或加工甘草的发了大财，唯一遭殃的是当地牧民。他们的农田被沙土掩盖，再不能种庄稼了；他们的草场成了沙丘，无草可食的羊群眼睁睁地被饿死。一个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草原生态被打破。

善良的牧民终于想到了求告政府。

在宁夏盐池县马儿庄，当他们53万亩草场只剩下10万亩不到的时候，一种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采取了行动。1993年6月，他们几十人结伴去了县政府，请求政府赶快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已经所剩不多的草场，保护他们一方平安。几天后，他们又聚集起更多的人，星夜赶往省城银川上访。上访受到自治区领导重视，立即召开会议，发出通知，层层贯彻，采挖甘草的不法之徒才得以退却与收敛。可是，四个月后的，就象是统一行动似的，采挖甘草的大部队又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几乎是带着一种报复的撒野。为了最后的生存，只得拼命了，牧民们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为此又带来一次又一次颇具规模的械斗。

到了1994年，随着甘草蓄集量的减少，价格的上扬，发财欲望的进一步激化，采挖甘草的队伍更加扩大也更加疯狂。有时，一处草场就能聚集三五千人的，比那冬修的水利工地更热火，往往一天就能毁掉500亩草场。在宁夏，甘草已由解放初期的1400万亩剩下了零头。在新疆巴楚县，十年浩劫期间还有甘草资源60万亩，